

廣東文史資料

第三十輯

(內部發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广东文史资料
第三十辑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3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189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1111·71 定价 0.99元

目 录

土地革命时期“左”倾路线对东江

地区革命的影响	古大存1
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	方 方11
第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、陆、惠、紫边区	
的革命斗争	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22
彭湃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几件事	林务农35
海、陆丰农民运动亲历记	余汉存54
一九二七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	黄 雍64
大革命时期的海丰农民自卫军	陈绍民71
彭湃与海陆丰农民运动	张云飞79
红二、四师进入海丰后的斗争	王克欧98
回忆红四师在海、陆丰的一些情况	朱道南104
海丰东南沿海的斗争	杨铁如107
在海南岛的革命洪流中	张开泰111
海南革命斗争亲历记	冯安全120
大革命时期的广宁县	
农民运动史实纪要	陈昭华134
大革命时期顺德县农民运动概况	何秋如212
花县农民运动纪实	卢克文241
《广东文史资料》第十三辑至廿九辑分类总目录	259

土地革命时期“左”倾路线对 东江地区革命的影响

古大存

一、第一、二次“左”倾路线的影响

土地革命时期东江的革命斗争是长期受“左”倾路线影响的，党中央召开的“八七”会议在历史上原有巨大功绩，但它助长了“左”倾情绪。这种“左”倾情绪在当时对东江起过一定的作用。

在“八七”会议正确决定的指导下，一九二七年爆发了海陆丰苏维埃运动。应该肯定，海陆丰苏维埃革命是正确的，它指明了人民革命的方向，鼓舞了广大地区工农群众坚持革命斗争，可是海陆丰苏维埃在巩固政权发展革命斗争方面带有“左”倾盲动主义，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强攻硬打，政治上树敌太多。没有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来战胜敌人，而是单纯依靠武装来打敌人，形成军队孤立作战。红军二、四师在攻打敌人强固堡垒如果陇、南岭等地，受到很大损失。当时领导上没有足够重视到二、四师的每一个指战员都是革命的宝贵财产，而是只顾争夺一城一地，与敌人拚消耗。如果能够使红军二、四师密切与农民结合，广泛地发动农民，指导训练农民武装，包围敌据点，伺机歼灭敌人，那末，海陆丰周围各地的革命将出现一种崭新的局面，后来反“围剿”也

不致缺乏力量。

一九二八年春，海陆丰苏维埃革命失败后，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，我们接受了这一严酷的教训，曾经在同年秋以后半年多的时间，埋头苦干，踏踏实实地深入农民群众，做了很多工作，因而在一九二九年春开始，根据地和武装有了恢复和发展，建立了红军第十一军，辖揭（阳）、五（华）、丰（顺）、梅（县）、兴（宁）的四十六团，潮（阳）、普（宁）、惠（来）的四十七团，潮（安）、澄（海）、饶（平）的四十八团，海（丰）、陆（丰）、惠（阳）、紫（金）的四十九团，兴宁、寻邬的五十团，各县区还成立了赤卫常备队，可以说，一九二八年秋至一九二九年，党对东江革命运动的指导是正确的。

一九二九年冬，立三路线开始对东江发生影响，因为那时文件已经到达东江。一九三〇年初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，这次会议是林道文同志代表省委来传达的（林道文同志原来是东江特委书记，后上调省委），主要精神是贯彻总暴动路线，会议还制订了十八条纪律：凡不听命令，泄漏机密，……都要枪毙。

立三路线在东江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：在组织路线上取消党的领导，以行动委员会领导一切；在军事路线上，提出集中攻坚。执行纪律，赏罚不明，十八条纪律如有违抗，条条都要枪毙，没有奖赏和鼓励；在思想上则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复仇思想。所有这些，都曾经给东江的革命斗争带来严重的损失。

当时东江方面立三路线的执行人是颜汉章，他是东江特委书记，又是东江行动委员会的主席。我虽为军长，实受行动委员会的指挥。在会上讨论集中攻坚的时候，我对此有异议，认为应该攻“要”，即攻打敌人要害的地方，不一定要找硬的打，但受到批评，说不敢攻坚是胆小鬼，逃跑主义。那时大家还没有体会到立

三路线的害处，不象今天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针可以衡量一切；那时没有什么文件，重要的文件只有《六大会议的决议案》、列宁的《暴动的艺术》，而且还是党内秘密传阅的，一切信件来往，阅后即马上烧毁。因此，那时党员的政策水平很低，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，凭自己的直觉来处理问题。比如党员只知道无产阶级，农民、地主、军阀……等等，而遇到具体人和事就往往不懂得作阶级分析，从而也就没有明确的依靠谁、团结谁、反对谁的策略思想；只知道坚决执行党的指示，不怕牺牲，就是好党员。党内的这种状况，使立三路线在东江的推行，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。

颜汉章书呆子气很浓厚，又有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，他当时很少下山，很少参加作战，只坐机关写字发命令，又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。他在军事上一窍不通，所下的命令，都十分机械，如发命令时生硬规定某时出发，某时到达，某时开始战斗，某时战斗结束，没有随机应变的余地，这就给下面指挥员在执行上带来很大的困难。

当时提出集中攻坚的目标，是汕头和潮安。但是，那时驻大南山的我军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，而潮安方面敌人则有几团兵力，敌在潮安城内驻一个团，在湘子桥驻两个营，在枫溪驻二个团。我对打潮安抱不同意见，主张攻打丰顺，因为丰顺四面为我势力范围，拿下丰顺，扩大影响，军事政治上都有利，但这个主张受到批评。在错误路线的指挥下我军三打潮安，损失不少，并且挫伤了士气。集中攻坚口号之所以错误，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拿我们的主力去和敌人硬碰。我们的每个红军战士，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，他们都是党的后备力量，和敌人硬碰，搞拚命主义，即使我们死一人，敌人死十人也不合算。在这个错误

的口号下，正确的东西得不到鼓励，而且要挨批评。如有一次我攻打丙村，消灭了敌人一个连，还被颜汉章批评“专找软的来打，可耻”！

集中的问题，实际上也没有集中好，当时虽有很大的决心搞武装，但实际做起来又不坚决。颜汉章对集中的决心也不大，军部实际集中的力量只有一个团及一个营一个连。四十九团不肯调动，与颜的迁就、不严厉有关。四十九团三〇年夏到南山，实际上也不是为了集中。四十九团团长彭桂是很好的干部，但政委黄强的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，不服从集中。五月间南山的林招战斗，完全是黄强的个人主义打起来的，实际上那一战是不应该打的，但是黄强为了显一显四十九团的声威，摆了一个阵势和张瑞贵一个师打硬战，还颁布了连坐法，一人逃走，其他受累，那一战虽然击退了敌人，我们也损失了不少骨干。

颜汉章是不是“AB团”，现在还弄不清楚。但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怀疑。有一次他叫古宜权（四十六团团长）去打安流，安流是敌人一个强固的据点，古宜权是很听命令的人，我怕他听了颜的命令而不根据实际情况来打，所以向颜提出由我去打。在安流打下后，颜汉章即派人带信给我，叫我马上到兴宁的双头去找他，说他们已经打下了双头，他已在双头等我。我在行近双头的途中，碰到农民，了解到敌人在双头驻了一团兵力。我回来质问他，他说宣称攻克双头是“鼓励士气”。

立三路线在东江苏区的实行，使党和武装力量受到损失，当时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。至一九三〇年冬或一九三一年一、二月间立三路线才结束，但是代之而来的是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。

二、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的影响

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，是以反立三路线的面孔出现的，但是比立三路线的影响更坏。在东江苏区执行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袁策夷。他在一九三一年春间来到东江传达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，指出反对立三路线，但实际上是以“左”反“左”，故后来有人称它为“新立三路线”。

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在东江表现出来的特点，在组织上是错误的，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，进行严重过火的斗争；在政治上、军事上的错误则是空喊口号，尽管当时只剩下很少兵力，还提出夺取大城市为目标；领导机关死守山上，写标语发口号，没有组织力量，推向平原活动，脱离了群众。

袁策夷担任东江特委书记，一次他以召开会议的名义，通知十一军的政治委员吴秉泰去特委，吴去后没有回，接着又叫我去，刚见面即对我说：“你来就好，我准备调你任军委参谋长，你现在去休息”，即叫警卫员送我到一個房子里把我关了起来。我初还不以为意，后来才知道是把我关押了，这时我才意识到上次吴秉泰没有回的原因可能被杀害了。我当时很气，叫守门的兵士给我开门，让我去见袁策夷，兵士说这是上头命令，他不敢开，我说：“由我负责，你尽管把门打开”。门打开后我即去找袁，质问他说：“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？要是共产党员的话，就不应该不问情由，把我关了；要是反革命的话，把我杀了，我也无话可说”。他表示：“你不要误会，不是这样的。”后来开了一个会，由颜汉章发言，说我是东江方面立三路线的执行人，由袁策夷宣布把我撤职，留党察看两个月。我反驳说：“颜汉章是东江行动委员

会的负责人，现在反说我是立三路线的代表，你们通知我来当参谋长，实际上是这样做法，这是不能肃清立三路线的。”袁说：“你还不服从处分，那就留党察看三个月”，还问我有什么意见，我说还有什么意见呢，提了一句意见就多留一个月，还有什么意见可提？

第二天，即派我去陆惠边区，当时的陆惠县委书记是陈醒光，（这人是怕死鬼，后来叛变），我到陆惠边区的任务是恢复政权的工作。行前我问袁，要不要改一个名，他说：“怕什么呢，不用改名”，不改名也有个好处，到农民那里，我就不怕了。我去了后，群众听到我的名字，附近邻里到处都有人来找我，我叫大家组织起来，果然不到半个月，就恢复了政权，两个月后，搞了两个红军连，成立一个独立营，我任营长。这时陈醒光调走，袁通知我继任陆（丰）惠（来）县委书记，后来黄超如来接任陆惠县委书记，我被调回南山，担任东江游击第一路总指挥，卢督茂任第二路总指挥，但第一路总指挥实际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，这个时期武装力量已受到严重损失。不久，组成一个大队，由中央调来的军事干部彭友初担任大队长。关于肃反问题，实际上“AB团”并不多。由于当时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，造成草木皆兵，加上肃反政策错误，这一来便给敌人可乘之机，为敌人所利用，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AB团分子，借肃反为名，反诬许多革命干部为AB团分子，大肆屠杀，另方面我领导人员惊慌失措，对凡是可疑的人随便逮捕，实行“迫供讯”，未加调查研究，轻易处以枪杀，以致错杀了很多。被枪杀的人有的是与党内宗派主义斗争纠缠一起的，如吴秉泰是在反立三路线开始时秘密杀掉的，颜汉章后来也被杀了。

肃反问题的提出，是由于福建富田事件发生以后，由中央提

出的。肃反问题的提出是正确的，但在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把肃反扩大化则是错误的。这次错误所造成的损失，最为严重。

“AB团”这个反革命组织为了迷惑、混蒙我们的耳目，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名目，如乌狗会、白扇会、社会民主党、改组派……等，在根据地和游击区造谣、破坏、张贴反动标语、制造紧张、恐怖气氛。就我所知，陈回、李荣华（二人都任过共青团特委书记）和黄强等人，可以肯定是AB团的头子，AB团在我们内部特别注意在青年中活动，他们提出“拥护青年利益，青年要读书”！“拥护青年利益，青年要结婚”！“拥护青年利益，青年要娱乐”！等口号诱惑拉拢青年，破坏党群、干群关系。例如指使青年以开展体育运动为名，把农民的好田地辟为球场，造成农民对党和政府严重不满。

袁策夷同志后来对敌人的这种破坏活动有所感觉，开始对肃反中的一些问题有所怀疑。在我任政治保卫局长时，才查出了一些问题，经过清理，一次放出了九十多被押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共青团员，从这些人中，我们摸出了陈回的活动情况。陈回在任团特委书记时，抓住团员的进步要求和幼稚无知等特点，个别问他们说：“你是不是想升党”，如果答想升党，就马上叫他们填表签字，然后带他们到一个无人的地方，说是开会，但实际没有开，只是几个人一起玩了一回，又带回来；过了十几天后，又说要开会，又如此玩耍一回带回来；如此经过三四次后，向大家宣布说：“你们已经参加了三、四次会议了，这是AB团的会，AB团是一个秘密的组织，你们如果敢报告，共产党里有很多我们的人，会对你们怎么怎么的。”然后又宣传参加AB团干革命有保险，被敌人抓了也可以免杀，以及AB团的力量如何强大等等。总之，

极尽恐吓、诱惑、欺骗的能事。在青年被迫加入AB团后，即指使他们进行破坏活动，如破坏部队的给养，闹伙食不好，故意擦破衣服、鞋、袜，说：“鞋擦破可以换新的”等等。在这些问题的发觉了以后，陈回已经逃跑。

黄强是AB团里面最凶恶的一个。在我被调去陆惠边工作的期间，原红十一军改编为红军独立二师，彭桂是师长兼红一团（原四十九团）团长，黄强是师政委兼红一团政委，彭桂的服从性是很强的，这就给黄以为所欲为的机会，尤其是彭桂不在的期间，黄强借肃反为名，诬害无数革命干部为AB团，杀死了七百多名我党的骨干。黄强之所以当上反革命，是因为苏维埃失败后，黄曾一度跑到香港，由于他父亲与陈炯明有亲戚关系，和反动派搭上了线。在他回来重新参加队伍时，我们对他失去警惕性，让他窃据了部队的领导权，在我们搞肃反时，给了敌人可乘之机。后来，我们证实了黄强的反革命面目，即派彭桂同志从南山赶回海丰根据地，抓到黄强执行枪决。

我们在大南山，还杀过一个江西逃亡地主。这个逃亡地主是从中央苏区逃出来的，他跑到大南山，说要参加我们的部队，说他会车衣等，我把他布置到山口的一个小店里车衣，叫他经常给我们送情报，他所送的情报，有时也是准确的，有一次布置他到揭阳了解敌情，我随即派另一个人跟踪，他不去揭阳，却跑到汕头，和汕头的阔人一起在酒楼上喝酒。回来时我们向他要揭阳的情报，他随便编造一些假情况，等问题被揭穿，他才面如土色，追问结果是江西的一个逃亡地主，把他执行枪决了。

从上面这些事实，可见反动派从革命内部进行破坏是猖狂的，他们所以能够如此猖狂，除由于我们缺乏政治警惕性被敌人打入内部这个原因外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反立三路线时犯了

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错误，以及肃反过程中惊慌失措，乱捕乱杀，反立三路线和肃反又纠缠在一起，以致敌人有机可乘。由于这个原因杀了不少人，他们中有的应该是镇压的反革命分子，但有更多是蒙不白之冤的革命干部和红军战士。由于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，有许多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便私自逃跑，脱离了革命队伍。革命势力遭到严重削弱，越来越没有力量反对强大的敌人反复进行的“围剿”，至一九三四年间东江苏区只剩下大南山一小块地方了。

袁策夷同志在一九三四年秋间调走，在他调走之前，我曾经向他提过，不要老是把部队放在山上，应组织到平原去开展游击活动。袁同意了此意见，在他将调走时，特委书记原安排我负责，我提出还是让我搞武装斗争，带队到平原活动，特委书记由李松山负责。领导上同意了这意见。在我下山后，约在一九三五年间，李松山带队到云落，整个特委机关为敌人全部抓去，李松山在那次叛变了，平原的党组织就全部为敌人所破坏。坚持斗争的十六个小队也为敌人消灭了；这十六个小队是被李松山一个一个的叫了出去，然后被消灭的。

在我下山以后，我头上长了一个肿瘤，非常严重，无法活动。这时李松山叛变的消息传来，十六个小队被敌人消灭，我在五华等地掩蔽了几个月后，于一九三五年冬，只得带队到大埔。我到埔后病未愈，但还带着两个连熬了两年，好在那一带农村农民对我们都很好。一九三七年，敌人知道了，派一团兵力来包围，但围不到我们（国民党的报纸也发表了这消息）。省委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派饶彰风同志来找我们，但没有打听到。当时我们因和外面断绝联系，不知道整个形势的变化，传单上还是写着打倒国民党的口号，直至一九三七年冬，我才化装出来香港，在香港

港找到了周恩来、叶剑英同志，这才和党取得了联系。

东江人民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，自从一九三五年李松山叛变，大南山为中心的苏区被攻陷之后，基本上停止下来。东江苏区革命战争的失败的原因，除了敌强我弱这点应该肯定外，主观上则是在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指导下，政治、军事策略上的失误造成了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；再则，没有很好的开展白区的工作，群众基础不够牢固，领导机关很庞大。后来实际上只剩下大南山的大石头了（南山是个石头山），还在那里天天喊保卫苏区的口号，因此苏区的反“围剿”斗争，实际上是处于孤立的状态。

三、关于根据地问题

东江根据地的成败，与以大南山为中心，还是以八乡山为中心也有很大关系，这个问题，特委在一九二九年和三〇年间，有过争论。当时我主张在八乡山，因为八乡山靠近中央苏区，它联系潮、揭、丰、兴、梅数县，地区广阔，可以和福建打通，而大南山不是一个大战场，一条云落公路如果被敌人切断，南山即成孤立之势；主张建立在大南山的同志则认为大南山群众基础好，给养方便，山形好、石洞多。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次争论中，特委起初是同意我的意见的，派我带了四十七团，打到江西寻邬，途中我因敌人阻击受伤，折了回来。以后特委就改变了计划，把根据地建在南山，一直至东江失败。

曾文记录整理

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

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

方 方

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，由于党内出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，至使国民党右派有可乘之机；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打到长江流域以后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篡夺了革命领导权，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把枪口刀刃转向革命群众，大革命陷于失败。潮汕地区的革命运动也转入低潮，广大工农重新喘息在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之下。

但是，石头压不住青草，血腥的屠杀，也吓不倒求解放的人们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走了，但群众说：“同志呀！你们的炉子是有轮子的，到处能搞饭吃，可是我们的屋子却不能搬啊！”不斗争，任令烧杀抢掠，如何得了。群众对统治集团的憎恨，可由下述民歌看出：“甫母蒋介石，害民如落药，管着天就旱，勿甫伊就着。”（潮语）

到一九二七年六、七月的时候，党便有了“恢复组织，秘密活动，联系群众，向敌人反攻”的命令，不久又提出“发动群众，以赤色‘恐怖’来答复敌人的白色恐怖”。广东区委也派了原任汕头总工会秘书长、地委委员陈振韬同志到潮汕指导各县工作。

各地工作的恢复，主要在最穷、最苦、受压迫最厉害的“食乡”开始，而宗主乡（大乡、大族）则从小姓弱房开始，另一方面

是靠山的偏僻乡村。虽然还不懂得“乡村包围城市”，“搞三不管的地方”的理论，但其发展规律是一样的。在普宁来说，一区的八乡、二区的四十股、三区的白水礮一带，四区的六乡子、五区的汤坑子一带，六区的四乡、七区的大径肚一带，八区的大坪山脚、九区的铁山脚一带都是长期斗争的据点，不仅对地主阶级仇恨极深，且都是靠着山区，便于和敌人进行斗争。

以赤色‘恐怖’去答复白色恐怖，鼓起勇气，制止敌人的凶焰是对的，必要的。但运用的时候欠缺策略，形成大烧、大杀、大抢的盲目主义，不利于发动更广大群众，是严重的错误。尤其敌人采取了疯狂的烧杀抢掠来对付据点，利用了大乡大族的被欺骗群众，组织“布袋队”来协助其抢掠奸淫时，据点群众的斗争怒火又只好遏住，要求武装队伍不要住在他们乡里，以免受累。那句：“同志啊，你们的风炉是有车轮的，我们的房子是不能移动的”的老话又在新内容下喊出来了。（意思是敌人来了，你们会撤退，可是我们的房屋要受焚毁。）

当南昌起义军进到潮汕的时候，已是秋末了，时间虽然很短促就失败（进驻汕头为期只有七天，老百姓叫做七日红），但整个潮汕城乡都被工农革命军占领，普宁最反动的堡垒——县城和果陇乡都被攻下，群众的兴奋情绪异常高涨。可惜当时党的政策有错误，一、不发给群众武器、武装群众直接行动以肃杀豪绅地主；二、土地革命纲领不彻底，不符合实际（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）；三、政治面目不明确，还打着国民党党徽的旗帜（海丰老百姓说是白色恐怖的象征）。当然，军事上也有错误，而且孤军作战，敌人得以集结兵力来对付我们，而且由于我们占据时间短促来不及采取措施做好群众工作，终于使革命的部队在普宁流沙圩溃败。

在这期间，普宁党所能做的事情除协助保证负责同志——如周恩来、贺龙、郭沫若……等安全撤出战区外，最主要是收集散落在各地方的伤病员同志和武器弹药（潮汕各县也都是如此）。因此，贺、叶军虽然失败了，但我们东江地区却有了军事干部，增加了武器弹药。而且当时各地党的组织也都先后恢复了。因而，武装斗争便蓬勃地发展起来，并且打出土地革命的旗帜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耕者有其田。群众唱出：“甫甫甫，田仔甫田主，田仔耕田耕到死，田主在家吃白米。地是天生个，起来共伊产，工农兵团结，打倒反动派，有穿又有食，人人都爽快”（潮语）。展开对地主反动武装剧烈的斗争，基本上控制了全潮汕的广大乡村。我们的武装当时命名工农赤卫团，汕头澄海为第一团，潮阳为第二团，潮安为第三团，普宁为第×团……各团都有共产党员作党代表，方思琼当时就是第三团党代表。由于海陆丰及广州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，革命的政治方向明确了，这给未来斗争指出了美丽的前途，增加了信心。及两地暴动失败后，队伍部分退到东江、潮汕，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师（袁国平——当时叫袁裕，是师长）。军事力量的加强，鼓舞了农民再度起来斗争，但可惜，当时党还没有斗争经验，一、不懂得建立根据地，建立政权；二、不懂得游击战争，只是强攻硬打；三、不懂得结合群众斗争，解决群众生活上的急迫要求，单纯军事行动，再加以敌人强大军事力量压迫，一直到是年（一九二七年）冬，斗争始终形成拉锯形势。一九二八年春，又因地委集中各县县委书记在汕头开会，被敌包围，结果省委巡视员为首的叶浩秀、地委书记陈振韬、市委陈国成，以及方临川、吴文兰等二十八人被捕，其中二十一人立即被敌枪决。同时党内又发生了方维精不服从领导，在潮汕组织三K党，与党对抗，部分武装又蜕化变成土匪（如张炳奎）；省

委巡视员沈青、徐克家二同志，又在揭阳五房山被敌袭击牺牲，各地农会干部被捉杀也很多，据点房屋多被烧光。于是群众斗争情绪逐渐低落，逃跑到南洋的人很多，许多大乡村的工作，被豪绅地主夺去，平原工作，大多转入秘密，武装都撤到山地，每县不过留存百数十人；且因连年苦战，住无定所，药物缺乏，以致患疟疾病的达百分之百。是年夏秋之间，斗争可以说几乎完全陷于休止状态，党的工作，只是开开会，教育党员，教育群众，坚持革命气节。

那年夏天，在彭湃同志领导下，惠、潮、梅党组织在南山召开代表会议，讨论当前形势和革命性质，会上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是民权革命，有的说是土地革命，有的说是社会主义革命，彭湃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做结论，敌人已来包围，会议被冲散，因此，各人都抱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工作地去。

秋末，省委书记李源同志亲自到潮、梅指导工作，他指出：“第一次革命高潮已经过去，第二次革命高潮尚未到来，我们的斗争方式必须改变，不能再搅暴动、不能硬拚硬打，必须善于发动群众，积极领导群众作日常生活斗争，由最低级做起，揭露豪绅地主反动军官的罪行，加他们以符合实际的丑恶绰号，秘密夺取他们管辖地区的作物鱼牧牲畜，搞到他们惶惶不可终日，以壮群众的胆量，然后逐渐引导群众以年成不好为理由，提出要求减租减息，一直到抗租抗息的斗争。同时结合组织地下武装，待机行动。”这个指示对于武装斗争受到挫折以后，地下工作应如何做的问题，给予了具体的解决。各地都依这个指示耐心而艰苦的去接近群众，教育群众，领导各种各式的斗争，一点一滴地扩大党的影响，储蓄力量。慢慢地把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，可惜的是，我们这位英勇而机智的工人阶级的儿子李源同志（海员工人，六